

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大革命失败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予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政权。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

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邓小平后来曾指出：

“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

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案例：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早在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当他看到林彪的“新年贺信”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党内军内的消极情绪。

1929年1月，一场大雪过后，井冈山格外寒冷。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与朱德会师，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向井冈山发起三次“围剿”。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等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

然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在赣南流动作战，打圈子。流动作战是艰难的。一天，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在寻乌圳下村宿营。拂晓，国民党军一部来偷袭。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来得及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一时，四面枪声大作，红军勇猛突围，跟敌人进行了一场肉搏战。毛泽东与贺子珍由警卫员掩护，蹚水过河，突围上山。朱德则手提冲锋枪与警卫员杀出一条血路，但是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突围时腿部中弹，不幸被捕，后来在赣州英勇就义。

就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依然没有放弃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其兵力分散，以便红军能够在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在大柏地，这样的机会来了。1929年2月9日，红军抵达大柏地。这天正好是除夕，紧随其后的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穷追不舍。红军官兵想：这还不让过年啦！为此，更加同仇敌忾。次日，大年初一，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将士，利

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给予刘士毅旅猛烈打击，使其不敢再追。大柏地战斗大捷，彻底扭转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不利局面，重振了红四军雄风，扩大了红军影响。四年后，1933年6月，毛泽东重返大柏地时，感慨万分，写下《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胜利固然能够让人欢欣鼓舞，但是，创建革命根据地依然是艰难的，面临着众多的艰难险阻，不仅有来自敌人的重兵围剿，还有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质疑和不自信。

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2月发出的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信中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内革命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主张“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同时，要求朱德、毛泽东两个人必须离开红四军。

毛泽东代表前委回信中央，指出关于中央在来信中提出的“分兵”和朱毛离队问题，红四军前委多数同志都持反对态度。毛泽东在信中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在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力量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

然而，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军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1930年元旦，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致信毛泽东，信中主张大敌当前，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信中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

早在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当他看到林彪的“新年贺信”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党内军内的消极情绪。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一封长信，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说：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的决心和信心。